

街头斯语：坦桑尼亚现代城市青年的话语实践

教缦云 阎自仪

【内容提要】坦桑尼亚独立后，政府极其重视语言问题，斯瓦希里语（下文简称“斯语”）的标准化及其推广被认为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手段之一。斯语的推广相当成功，很快成为坦桑尼亚人的通用语言。在政府一直强调标准斯语的使用的同时，坦桑尼亚的城市居民创造并发展出一种更加口语化的表达形式，即街头斯语。这种街头斯语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受到学者关注，80 年代末于城市地区快速发展，其使用者多为城市青年。本文整理了笔者 2008—2016 年在坦桑尼亚田野调查的数据，通过比较之前具代表性的街头斯语字典，用大量实例归纳街头斯语的演进和特征，分析其创造者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进行话语实践，并探讨这种实践与坦桑尼亚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街头斯语”含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鲜活体现了其时代意涵，它的成熟期伴随着非洲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浪潮，而街头斯语作为青年人群的话语实践，在与标准斯语的碰撞和融合中发展。在进入新千年后，“街头斯语”的研究实际上成为世界学术斯语研究的一个位面，它的大部分词语依旧保持了可解读性，这种包容性和灵活性等也嵌入现代社会变迁之中。

【关键词】街头斯语；城市青年；社会变迁；话语实践；坦桑尼亚

【作者简介】教缦云，中国传媒大学坦桑尼亚研究中心负责人、斯瓦希里语专业讲师，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斯瓦希里语博士

候选人，研究方向为斯瓦希里语语言文学、东部非洲研究；阎自仪，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9 级斯瓦希里语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斯瓦希里语语言文学、东部非洲研究（北京，100024）。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是东非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境内本土语言种类繁多，夏季语言研究所（SIL International）^① 的调查认为坦桑尼亚约有 129 种语言。^② 由于近代殖民统治和人口流动，一些非本土语言在坦桑尼亚境内也较活跃。尽管语言环境复杂，但坦桑尼亚实质上将斯瓦希里语（下文简称“斯语”）作为本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使用。^③

“斯瓦希里”（Swahili）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海滨地区”。斯语开始使用的具体年份不详，目前国内引用较多的是学者齐拉格丁的研究，他认为公元 1 世纪起，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便开始同东非沿海居民开展贸易活动，经过长期的交往、通婚和融合，最迟在 14 世纪其已在基里瓦王国的宫廷中使用。^④ 它以班图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框架为基础，混合了阿拉伯语、英语等语言。^⑤ 作为一门应东非沿海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商业用语，它随着贸易的扩展也逐渐传入内地。19 世纪末，德国殖民者占领东非，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德属东非（Deutsch-Ostafrika）将斯语设立为用于管理当地人的通用语并大力推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已在东非建立殖民统治的战胜国英国把德属东非的大部分地区通过联合国托管地（East Africa Protectorate）的方式纳入版图，成立了东非地区语

① 夏季语言研究所为国际非营利科学组织，本部在美国达拉斯。

② Unknown, “Tanzania-Languages | Ethnologue”, in David M. Eberhard, Gary F. Simons and Charles D. Fennig (eds.),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wenty-fourth Edition*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thnologue.com/country/tz/languages> [Accessed: 30 May 2021].

③ 现行坦桑尼亚宪法以斯瓦希里文为基础，虽然没有关于官方语言的表述，但根据历史传统和实际语用，斯语是实际意义上的主要官方语言，但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

④ 史哈布丁·齐拉格丁：《斯瓦希里语在东非各国的民族意识、团结和文化上的作用》，《语言学资料》1965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⑤ Jan Blommaert, *State Ideology and Language in Tanzan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3.

言(斯瓦希里语)委员会^①将斯语进一步规范化,推动其在大陆的发展。1961年坦桑尼亚独立后,尼雷尔总统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将斯语定为国语,并在全国大力推广,以求推进扫盲教育和全民义务教育。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斯语,坦桑尼亚政府设立了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BAKITA)^②,发展和维护标准斯语在学校教科书、文学著作、音乐文本及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的使用。^③这一语言政策已使斯语成为坦桑尼亚人的通用语言。

坦桑尼亚在国家层级制定普通话的规则并严厉施行,并不代表其他交流语言的消亡,实际上操着各类斯语方言和各部族语言的人群仍在非官方的领域和私人场合使用自己习惯的语言。并且随着城市化、全球化的加剧以及坦桑尼亚自身社会的发展,在城市街头出现了不同于标准语言的斯语,即街头斯语(Kiswahili cha Mtaani^④)。20世纪80年代末,坦桑尼亚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调整,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比例在最初略有降低,但实际上街头斯语实践者的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等互动更加频繁,经历了更为剧烈的词语更迭。但短时间内人口过多集中于大城市或新兴城区^⑤,也导致大批人群因失业而陷入贫困甚至流落街头、违法犯罪,其中,年轻人受冲击最大。斯瓦希里流行文化研究者罗斯特-扬(Uta Reuster-Jahn)认为“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在非洲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城市的年轻人有一种在传统身份框架和西式的、大都会式的身份以外创造和建立自己(语言)身份的压力”。^⑥

那么,街头斯语的话语实践有怎样的社会特征,其创造和发展彰显

① East Africa Inter-Territorial Language (Swahili) Committee.

② 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Kanuni za Sheria ya 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Baraza la Kiswahili la Taifa, 2019, p. 5, <https://www.bakita.go.tz/documents> [Accessed: 7 May 2021].

③ Tanzania Jamhuri ya Muungano, “Sera ya Utamaduni”, 1997, Retrieved from <http://www.tz-online.org/> [Accessed: 7 May 2021].

④ 坦桑尼亚本地人彼此间谈及街头斯语时大多使用街头的语言“Lugha ya Mtaani”,而面对外国人谈及街头斯语时往往使用“Kiswahili cha Mtaani”,也有强调街区是复数的说法“Kiswahili cha Mitaani”。

⑤ 张家旗、陈爽、Damas W. Mapunda:《坦桑尼亚城市体系演变与空间分布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18年第1期,第25页。

⑥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b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79.

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属性和时代意涵？对此，笔者于2008—2016年在坦桑尼亚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大量实例和对比分析，归纳街头斯语的主要创造者和使用者特征，分析这一语言实践的包容性和变化性，进而探讨其与坦桑尼亚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 研究回顾

20世纪50年代，随着街头斯语在坦桑尼亚民间的传播，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斯语变体语言，最初街头斯语是以“斯语俚语（Swahili Slang）”“斯语口语（Colloquial Swahili）”等说法出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逐渐习惯使用“街头斯语”来表达这一非正式的变体语言。这些研究者主要是欧美和东非本土国家的学者，他们使用英语或斯语进行写作，且注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阐述和分析街头斯语的社会意义。

20世纪中叶，戈维尔（R. H. Gower）开始发表关于斯语新词语创造过程的文章。在1952年的《以英语为借词的斯瓦希里语》^①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俚语为斯语带来新发展。1958年他又发表了《斯瓦希里语俚语》^②一文，指出斯语俚语是在城镇产生和发展的，且年轻人是俚语创造者中最多产的群体，他建议学者们关注并去记录斯语俚语丰富的表达。到1987年，波兰语言学家奥利（Rajmund Ohly）编纂了一本含有1500个术语和短语的《斯英俚语词典》^③，并在序言里将这些斯语俚语称为“街头化表达（Usemi wa Mitaani）”。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俚语词典中的词语来自奥利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实地调查，因街头斯语更新换代较快，部分词语在当代的街头斯语中已不再使用，但无论如何他的整合为街头斯语之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0年，比利时社会语言学家布鲁马特（Jan Blommaert）在其所著文章《斯瓦希里语的标准化和多样化》中指出了受英语干扰的斯语变体

① R. H. Gower, “Swahili Borrowings from English”,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22, No. 2, 1952, pp. 154 - 157.

② R. H. Gower, “Swahili Slang”,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Vol. 51, 1958, pp. 250 - 254.

③ Rajmund Ohly, *Swahili-English Slang Pocket-Dictionary*, Vienna: Afro-Pub, 1987.

语言的存在,并且“英语干扰非常常见……整合程度很高”。^①布鲁马特把这种变体语言叫作“街头斯语(Kiswahili cha Mitaani)”,并称这种语言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的行话。^②2004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学者基霍尔(Yared Magori Kihore)第一次用斯语发表文章,研究街头斯语报纸语法问题。^③他通过分析街头报纸的语句发现部分文字具有街头语法特色;由于报纸上的街头语句在国内的各大地区传播,他认为整合街头语法和词汇有利于后续深入研究街头斯语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意义。

2006年,当时在德国美因茨大学的罗斯特-扬与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基斯令(Roland Kießling)合作,以2000—2006年在坦桑尼亚进行的研究为基础,共同完成论文《坦桑尼亚的街头斯语》。该文主要从形式、功能、媒介、性别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街头斯语的现象进行研究。基斯令主要采用字典学和民族志的方法,编写了一本街头斯语的字典。罗斯特-扬(Uta Reuster-Jahn)则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和文学两大角度详细介绍了街头斯语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并指出街头斯语可以归类为一种城市青年语言,它的兴起是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并且它在话语层面强化青年身份的同时,也在超越青年群体、成为城市身份的标志。^④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街头斯语开展的研究也很多见。比如2013年布鲁马特(Blommaert)出版了著作《坦桑尼亚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语言》,他将街头斯语识别为一种城市语言,所使用术语为“城市斯语(Urban Swahili)”。在斯语与社会这一部分,他分析了坦桑尼亚的校园斯语(Campus Swahili),他观察发现,学者们与同事交流时使用校园斯语,而对于身份尚不清楚的人则使用标准斯语;他还发现,校园里知识分子使用的这种斯语形式也被电台所使用。但是,这位作者似乎有些歧视非洲语言,他认为,校园里的学者在进行混合英语词语的斯语交流时,“英语

① Jan Blommaert,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Kiswahili”, *Kiswahili*, Vol. 57, 1990, pp. 22–32.

② Jan Blommaert,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Kiswahili”, *Kiswahili*, Vol. 57, 1990, p. 24.

③ Yared M. Kihore, “Masuala ya Kisarufi katika Magazeti ya Mitaani ya Kiswahili-Tanzania”, *Swahili Forum*, Vol. 11, 2004, pp. 112–117.

④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p. 1–196.

元素在语音学意义上被斯语‘污染’了”。^① 2019年，德国美因茨大学的纳森斯坦（Nico Nassenstein）和非洲学者宝·博瑟（Paulin Baraka Bose）合作，从语言形态学角度，分析斯语在坦桑尼亚、刚果（金）和肯尼亚三个国家的四座城市中青年俚语的不同语用，^② 并对当地的青年语言实践结构进行分析和论证。他们发现四地的流行斯语（Popular Swahili）^③ 都具有一些特定的形态句法特征，都是标准斯语的变体。这也较清楚地表明俚语现象在当代非洲斯语国家普遍存在，街头斯语或者说论文中“Lugha ya Mitaani”的说法是坦桑尼亚对于其本国的斯语变体的命名方式。

实际上，新千年后注意到街头斯语的学者很多，比如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坦桑尼亚的邦戈音乐（Bongo Flava）来研究街头斯语。邦戈是坦桑尼亚经济政治中心达累斯萨拉姆的俚语名称，有时也指代坦桑尼亚。^④ 邦戈音乐是一种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的坦桑尼亚现代音乐流派，主要是美国嘻哈音乐和传统坦桑尼亚音乐风格交融的衍生物，歌词通常以斯语或斯语混合英语写成。这一题材的研究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恩勒特（Birgit Englert）于2003年发表的《仍然隐藏的邦戈音乐：来自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的地下嘻哈》^⑤ 和2008年发表的《交织交错——坦桑尼亚青年文化中的主题和语言选择》^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汤普森（Katrina Daly Thompson）于2010年发表的《“我是马赛人”：以邦戈音乐解读种族戏仿》^⑦，等等。

另外，还有少量研究关注街头斯语在具体传播媒介中的使用情况，

① “...be it that the English elements have been phonetically ‘contaminated’ by Swahili”, See Jan Blommaert, *State Ideology and Language in Tanzan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93.

② 四座城市为达累斯萨拉姆、戈马、卢本巴希、内罗毕。

③ Nico Nassenstein and Paulin Baraka Bos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Kiswahili Youth Language (s): Evidence from Dar es Salaam, Goma, Lubumbashi and Nairobi”, *Linguistics Vanguard*, Vol. 6, 2020, p. 10.

④ 沈玉宁编《新编斯汉语词典》（在线版），<http://siwaxili.com/>，2014，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26日。

⑤ Birgit Englert, “Bongo Flava (Still) Hidden ‘Underground’ – Rap from Morogoro, Tanzani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Afrikastudien*, Vol. 5, No. 3, 2003, pp. 73–93.

⑥ Birgit Englert, “Kuchanganyachanganya-Topic and Language Choices in Tanzanian Youth Culture”,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20, No. 1, June 2008, pp. 45–55.

⑦ Katrina Daly Thompson, “‘I Am Maasai’: Interpreting Ethnic Parody in Bongo Flava”, *Language in Society*, Vol. 39, No. 1, August 2010, pp. 493–520.

比如布鲁马特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坦桑尼亚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语言》中提到广告会使用街头斯语以增强宣传效果。^① 加纳大学的扎赫内-夸希 (Josephine Dzahene-Quarshie) 在其2016年的文章《全球趋势本土化出现在加纳和坦桑尼亚学生的短讯交流中》^② 中提到青年学生用手机发短信时, 倾向于使用简洁的、缩略的、非正式的斯语。

如前文所述, 非洲斯语区的年轻人使用国别化的俚语是一种普遍现象, 肯尼亚年轻人使用的 Sheng 语也有很长的研究历史。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戈提奥拉 (Chege Githiora) 发表过一系列关于肯尼亚俚语 “Sheng” 的研究成果, 其中以2018年的《Sheng——肯尼亚斯瓦希里语俚语的崛起》为其集大成之作。^③ 内罗毕大学的伊雷贝姆万吉 (Iribemwangi) 也在多次参会演讲中总结道, 当今的学术界已经不能再将肯尼亚的青年语言 “Sheng” 蔑视为一种年轻人和低端人口所使用的都市交集代码了。^④ 在内罗毕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学者沈玉宁曾直接用 “Sheng” 语创作诗歌, 记录对内罗毕人生活的观察, 但很遗憾尚未在学术期刊详细发表对该肯尼亚俚语的观点。^⑤

总而言之, 国内外学者对街头斯语的研究相对丰富, 体现出如下四个特点。第一, 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上述学者基本都有在东非特别是坦桑尼亚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其依据的分析资料也多基于由学者本人或联合其他学者实地调研所得的事实, 而非武断的二手结论。第二, 以社会语言学为支撑。由于街头斯语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在国坦桑尼亚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所以此类研究倾向于与民族志等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相结合, 力求服务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第三, 以双语或多语分析

① Jan Blommaert, *State Ideology and Language in Tanzan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3.

② Josephine Dzahene-Quarshie, “Localizing Global Trends in SMS Texting Language in Ghana and Tanzania”, *Swahili Forum*, Vol. 23, October 2016, pp. 1–20.

③ C. Githiora, *Sheng-Rise of a Kenyan Swahili Vernacular*, Suffolk: Boydell and Brewer, 2018.

④ P. I. Iribemwangi, “A River from Rivulets? A Study of Sheng Vis-à-vis Indigenous Kenyan Languages and Modern Technology”, *As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49, 2020, pp. 27–46.

⑤ 在一首名为 “Washikadau” (Stake Holder/利益相关者) 的诗里, 他打破斯语传统诗歌里以海滨地区传统为主导的音节、韵律, 部分混合了内罗毕当地一些常见的基库尤语表达记录了自己对内罗毕居民生活的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肯尼亚斯语外教 Frederick Bosire 作评。见 Frederick Bosire, “Reading ‘Washikadau (Patrons)’”, Retrieved from <http://yellingstone.info/?p=1948>, 2019 [Accessed: 20 June 2021]。

为背景。由于近年来街头斯语受到外来词汇的影响越发明显，所以多数学者会结合英语等非坦桑尼亚本土语言来分析街头斯语词汇的丰富和发展。第四，以个例分析为重点。街头斯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且街头斯语词汇基本由学者与坦桑尼亚本地人的日常交流或深度访谈所得，具有一定特殊性，需要较长时间的背景分析、过程精炼。

三 斯语变体：源于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群体

伴随着德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坦桑尼亚不断融入全世界工业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持续发展，虽然坦桑尼亚独立初期户籍管理制度的严苛性和实施方式与殖民时期稍有不同，但城市化进程只体现在农村青年涌入城市的速度上，总体趋势并没有太大差异。从1967年至1988年，坦桑尼亚总体城市化率由5.7%增长至17.8%。^①20世纪80年代，随着坦桑尼亚乡村公有制的乌贾马（Ujamaa）运动式微，大量待业或失业的乡村青年在坦桑尼亚城市地区聚集，其中以达累斯萨拉姆为甚，1988年该市人口已超百万。^②这一重大社会变迁为坦桑尼亚形成和发展出一门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极具口语化色彩的城市青年语言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话语虽然基本遵循标准斯语的语法框架，但为适应街头青年的表达需求，其语言内涵和构造方法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人们将其称为街头斯语。

年轻人自发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变体，并非因为没有用于交流的语言基础。街头斯语能够得到发展，其最重要的前提是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期标准化的斯语已经成为当地普遍应用的官方通行语言。这得益于政府长期以来对斯语的重视和推广，除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殖民者的标准化政策外，早在1962年10月尼雷尔总统就正式将斯语定为坦桑尼亚的国语，此后政府又设立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负责斯语标准化的相关事

① Hugh Wenban-Smith, "Population Growth, Internal Migration and Urbanisation in Tanzania, 1967-2012: A Census-based Regional Analysis", London, UK: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er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er, April 2014, pp. 3-8.

②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Planning, Economy and Empowerment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Analytical Report", August 2006, p. 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bs.go.tz/nbs/takwimu/references/2002popcensus.pdf> [Accessed: 8 July 2021].

宜。以标准斯语的语法框架为基础,街头斯语实际上是在对标准斯语和一些外来语词汇的改造中所形成的,虽然存在一些借用当地其他班图语语法现象,但比例微乎其微。街头斯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囊括了衣食住行、身份地位、两性关系等多个方面,由于其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为失业的街头男性青年,其中因部分人从事某些犯罪活动^①,使得犯罪行话也被吸收进其中。

从语言分类学上讲,街头斯语并非一门独立的语言,创造者基于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领域的现有词语,先在小团体里发明一定的密码,再通过打破部分语言规范来完成每一个具体的交流场景。它是一门斯语的变体语言,经常以“年轻”“新潮”的姿态出现,不断挑战特定时间段的斯语主体语料,在这种“挑战式沟通”语言实践中创造的词语,或为标准斯语所吸收或被遗忘在某个特定年代。甚至可以说,街头斯语伴随了标准斯语作为一门新兴语言的整个词汇扩展过程。在创造新词的过程中,街头斯语外来词语的来源往往与词语发明的时代息息相关,在笔者2008年开始的考察中,外来词语中有大量的英语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街头斯语就是由英语元素构成的,这可能和考察方法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远离城市中心和大学校园之外的地区,街头斯语中也几乎没有英语词汇。^②

街头斯语是一门具有能动性的语言。它从内容和形式上以诙谐和挑衅的手法表达了反抗传统与权威的态度,这也是城市青年语言(Urban Youth Language)的特征。^③作为一门城市青年语言,它并非因不完全二语习得而产生,而是说话者有意识改造的产物。青年群体试图扭曲现有的语言规范,为拥有共同语言或相似背景经历的人寻找一种交流媒介,基斯令和马登·穆斯(Maarten Mous)也指出,这同时也将农村人、老一代人、上流阶层等排除在外,使得青年群体能够刻意保持与社会其他群

①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30.

②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3.

③ Roland Kießling and Maarten Mous, “Urban Youth Languages in Afric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Vol. 46, No. 3, 2004, p. 325.

体的距离。^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街头斯语是一种只在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才被使用的语言，是某一年龄组认同的表征。虽然街头斯语不断被传播并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和使用，但是在这些使用人群中，待业青年是街头斯语创造和表达的主力军，尤其是男性青年，坦桑尼亚人赋予了这类青年一个特殊的名字——“石头旁的青年”，斯语是“Vijana wa Vijiweni”。“Vijiweni”表示在较小的石头处，结合语境，指的是街边不太大但能坐几个人的石头附近，这种表达点明了待业青年会集的地点。当然，该术语不单指在街边石头上聚集的青年，同时也指在其他某些固定场所聚集的待业青年们。这些青年大多数为男性，年龄在15—35岁，失业或没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无钱进行高端娱乐消遣活动，因此，他们只能通过闲聊打发漫长的时间，发泄旺盛的精力。

既往的研究告诉笔者，街头斯语在城市化过程中由发展核心区域即城市开始，向乡村地区扩散，其中坦桑尼亚沿海的达累斯萨拉姆是街头斯语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城市。近50年来街头斯语的壮大，甚至更轻易地融入标准斯语，很大程度上是屡经调整的乌贾马运动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年轻人对更自由化社会的向往造成的。尤其是1985年尼雷尔卸任坦桑尼亚总统后，政治变革背景下的媒体自由化，坦桑尼亚1993年后开始允许进口电视^②，同年政府也开始允许私人广播，这些都加剧了街头斯语对坦桑尼亚公共领域语言使用的影响。科技发展和政策调整为青年人提供了接触嘻哈音乐和国际说唱文化的硬性条件，而相对宽松的媒体环境也让年轻人更容易创作出抵抗传统文化规范、树立个体身份这样的软性可能性。尤其是邦戈音乐，它融合了本土音乐元素和外来音乐元素，被称为东非的嘻哈音乐，创作者往往会在歌词中加入街头斯语以增强吸引力。此外，街头小报和网络社区等媒介也广泛使用街头斯语，这使得街头斯语成为年轻一代的语言。

综上所述，街头斯语是标准斯语的变体语言，其更新发展速度更快，以不同历史时段的外来概念作为创造新词的源泉。它是一门城市青年语言，由特定的青年群体创造并使用，依托音乐等大众传播手段不断完成词语的经典化。虽然坦桑尼亚人很早就自发地创造出一些俚语和口语化

① Roland Kießling and Maarten Mous, “Urban Youth Languages in Afric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Vol. 46, No. 3, 2004, pp. 312–313.

② 在此之前，坦桑尼亚政府禁止进口电视设备。

的词语,但它们以前受到更多的限制,仅限于非正式场合使用。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大量街头词语被创造出来,其融入主流社会的速度更快,这种以坦桑尼亚社会发展变化为基础的变体语言,是坦桑尼亚现代社会的综合剪影,作为青年人群的话语实践嵌入宏大的社会变迁之中。

四 包容性与变化性:基于街头斯语词汇的比较分析

坦桑尼亚街头斯语的产生与其创作者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最初的使用者通常是年轻人,在内容呈现上也侧重这一年龄层的社会生活,在逐渐发展为一门城市语言后,它传播到更多的群体,并吸引学者对街头斯语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在这些词条收录性作品里,以上文提及的罗斯特-扬和基斯令编写的街头斯语字典(下文简称为“罗基字典”)为代表,他们的字典包括 1100 个单词及短语,为二人于 2000 年至 2006 年在坦桑尼亚收集所得。^① 他们根据涉及领域将街头斯语分为人与社会关系(Human and social relations)、交流表达(Communication)、体态面貌(Body & Appearance)以及经济、金钱和职业(Economy, Money & Occupation)等 19 个类别^②,这些类别囊括了坦桑尼亚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问候致意、衣食住行、娱乐活动、失业没钱的现状以及某些领域的专门指代等。笔者于 2008 年至 2013 年在坦桑尼亚田野调查时也收集了大量的街头斯语,并于 2013 年至 2016 年进行增删和校正,最终保留了 787 个街头斯语单词及短语。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词汇分类与罗基字典基本吻合;但部分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拼写和含义的变化;新增并进一步拓展了原有分类。经过比对,笔者发现街头斯语在发音上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当地人使用时并不认为街头斯语只有一种标准,而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新的数据表明部分街头斯语词语经历不同时期后仍保持了相当高的稳定性,这也表明在进入新千年后,坦桑尼亚的社会变迁更趋向于包容

①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13.

②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p. 20 – 30.

年轻人的生活实践，不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社会剧变。

(一) 形近意同

街头斯语注重口头传播的载体，注重在可预计语境中信息的传递，鉴于此，其对语法和发音的苛求较少，可以看到街头斯语中部分词语出现多种说法^①，比如斯语中发音较为接近的“r”和“l”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音韵学音位，一是两音更换导致意思变化的例子极少^②，二是具体发音的选用与使用者的性别和部落族群也有相关性。^③

坦桑尼亚说唱歌手朱鲁（Juru）演唱的说唱歌曲《Mburula》^④就是笔者收录的“mburula/mbulula”（笨蛋）一词的来源。在歌曲里他描述了一类长得好看、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他们吹嘘自己会用社交软件，每天忙于读书考试或上班工作，穿进口自中国的时尚衣服，可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干，每天在街头闲逛。这首嘻哈音乐在坦桑尼亚流传甚广。后来相似的概念也出现在一则电视广告里，广告中老师先问一位同学一加一等于几，这位同学立刻给出了正确回答，可之后老师问一位名叫 Mbulula 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他却回答说是六。自此，当地人就用“mbulula”代指脑子有毛病的人。街头青年们也以“mburula”代称笨人、笨蛋。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出现了“mburura”和“mbulura”两种拼写方式。虽然罗基字典中并没有收录这个词条，但是他们的字典和笔者的数据库里都有很多这样 r/l 混用的现象，比如“gwara/gwala”（五）、“mpoli/mpori”或“mpolipoli/mporipori”（乡下人/泥腿子）等。

另一种形近意同的情况，是由词语提供者自身使用习惯不同造成的，比如“kukandamia”和“kukandamiza”，这两个词在街头斯语里都指“把食物捏扁放进嘴里；进食”，罗基字典收录的是后一个，该词是标准斯语中“捏扁、压扁”的意思。“Kukandamia”是笔者信息提供者的说法，也是正确的。这个例子说明，在街头斯语的进化过程中，坦桑尼亚各部落

① 通常为两种，个别出现三种及以上的说法。

② 常用词里可能仅“kalamu”（笔）和“karamu”（庆祝活动）这一对最小对立组。

③ 标准斯语的 <r> 为颤音或者常说的大舌音 [r]，部分坦桑人自身部族语言里没有 [r] 这个音时有些人会用 [l] 来代替这个音，另外部分年轻女性有在标准斯语出现 <r> 的单词上发 [ɹ] 音的现象。

④ Juru, “Mburula (Official Video)”,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5cWc7RcD4> [Accessed: 19 July 2021].

族群在不同时期都对这个语言变体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造,标准斯语里“kukandamiza”表示动词使动式的词素是-iz-,而在很多班图语里这个词素是-i-,这也是“kukandamia”这个词的来源。^①

除此之外,部分词条的收录形式不同是由语境不同造成的,很多已经进入标准斯语的词语,就更难区分源头。比如罗基字典里收录的“asali wa moyo”一词,字面意思是“心的蜂蜜”,意指“亲爱的、甜心”或“男女朋友”,收录自邦戈音乐一首同名歌曲。这个词组里的连接小词wa说明这个名词词组的主名词是“有生命的”,在教学语法中被称为WA类名词(或yu/wa类名词),但这是一种象征手法,因为斯语中“蜂蜜”一词属于N类名词(或i/zi类名词),连接小词本为ya,这也是笔者在考察时收录的词条。在多方询问后,笔者的信息提供者依然肯定“asali ya moyo”的写法,他们讲道,“男女朋友就像心中的蜂蜜般甜蜜,蜂蜜原本就是指日常可以食用的蜂蜜,所以可以使用ya”。

最后,还有少量是拼写喜好问题。街头斯语是口语化的语言,通过记录的方式让它书面化的过程也受个体学者的偏好以及语言信息提供者本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比如罗基字典里收录的“-nyea debe”(逮捕入狱)、“wa kuja”(乡巴佬)、“deiwaka”(临时工),笔者按照信息提供者的建议分别收录为“-nyeadebe”、“wakuja”和“dei waka”。

总而言之,这类形近意同的条目虽然在拼写和组合上存在细微差别,但意义相同,这些各自的偏好并不会导致出现交流障碍,其中不少词语在频繁地使用中已进入标准斯语,清晰地体现了街头斯语和标准斯语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

(二) 形同意变

街头斯语是东非斯语区青年俚语的一部分,其发展不会脱离时间和地域的框架,有一些单词的意义随着使用者的认知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笔者虽然不能逐个考察全部词语的历史变化过程,但是部分单词的使用差异是有迹可循的,这里笔者通过一些案例展示从语言角度记录下的非洲国家追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有些单词意思的流变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物料、食材的重要性

^① 在标准斯语里只残留了极少有早先班图语线索的单词,比如“-tuma”(派出)和“-tumia”(使用)这一组对应的动词,感谢沈玉宁提供的坦桑尼亚其他班图语言的信息。

发生了改变，比如罗基字典中收录的“debe”为“船；汽车；迪斯科舞厅”，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其词义为“塑料；剪彩的绶带”。“Debe”一词本身的意思“一种盛物的器具”，这种词义的变化是因为在不同时代所默认使用的制造材质不同了。在罗基字典所记录的年代里，器具主要由金属（铝）制成，“Debe”便有了船和汽车之义，后来制造器具的材料更多为塑料，所以盛物的“debe”多指一种塑料缸。^①食物的名字往往能更加清晰地记录社会的变迁，以“zege”为例，在罗基字典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玉米和豆子混在一起煮的坦桑常见饭肴”^②，而十年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zege”指代的是“一种非洲流行食品，薯条鸡蛋饼（chips na may-ai）”。由于“zege”在标准斯语里的意思是“混凝土”，所以涉及食物的时候它其实是指一种“混合”的方式。笔者推测，在坦桑尼亚当地由于玉米和豆类混煮已成为一种传统菜式，一种叫“makande”（单数 kande）的表达也逐渐成为这种搭配的稳定叫法，而薯条鸡蛋饼这种现代的快餐菜式就采用了“zege”这个名字。简而言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食物新潮混搭方法。

有些单词意义变化不大，但是所表示概念的某些位面被强调出来，成为一种根植于原义的引申。比如“chokoraa”在罗基字典里给出的解释是“无家可归的孩子”^③，该词源自动词词干“-chokora”^④，在斯语俚语中是“挖东西、翻东西”之义，其名词“chokora”用来指以翻垃圾为生的流浪儿。笔者观察到的情况是“-chokoraa”新增了“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意思。

但有些单词原意模糊，使得这种引申很难溯源，比如“-chana”在标准斯语中指“梳理（头发）；把某物撕成一块块”，罗基字典中分别收

① “Debe”还有一些其他的引申含义，囿于篇幅不再赘言。

② “Maize and Beans Cooked Together, Common Dish in Tanzania”,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105.

③ “Homeless Children”, See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107.

④ 罗基字典的编者因为忠实呈现发音的原因将其拼成两个 a，在其他字典中也有“-chokora”“-chokoa”的拼写方式。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比如在标准斯语“kijana”（青年）在俚语表达里实际的发音是 kijanaa。

录了两个意思,一是“变胖”^①,一是“在考试中表现优秀”^②,他们认为第二个意思是“撕成一块块”的象征用法,对第一个意思的来源没有给出任何说明。笔者推测,在某种斯语方言或某些东非海岸附近的班图语言中“-chana”曾经有“扩展”、“生长”或“变胖”的意思。这一推测源于标准斯语中存在的提示性信息,比如带有使动词素的“(-) chanya”指“聚积”或“正的、非负的”,“-chanua”指“在狭窄的空间内变大”或“开花”。笔者收集到的“-chana”的意思为“说白了,打开天窗说亮话”^③,与罗基字典收录的意思不同。另一个溯源很有难度的词是“mnoko”,罗基字典中收录的意思是“严厉拘谨的人;告密者”^④,他们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给出的词源是“nokoa”(殖民经济中农场主的副手),在笔者收集到的资料里这个单词增加了“伪君子”^⑤、“恶劣的人”^⑥、“照章办事、随波逐流的人”^⑦等含义,笔者认为他们给出的词源是正确的,但这个词条成熟过程中必然受到了坦桑尼亚独立早期流行文化的影响,通过独立后第一代剧作家易卜拉欣·侯赛因(Ebrahim Hussein)的名作《金吉克蒂勒》(*Kinjeketile*)中恶毒反派角色殖民庄园监工的名字“Bwana Kinoo”^⑧就可以追溯到这个单词。

综上所述,形同意变的案例反映出街头斯语在各个时代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它既能在词语核心含义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整,也能把词语原本的含义不断扩展延伸、推陈出新。

① “-nenepa”, “grow fat”, See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103.

② “-fanya vizuri katika mtihani”, “do well in exam”, See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103.

③ 例句: Ninakuchana jambo hili. 我跟你直说了吧。

④ “Someone Too Strict: Gossip”, See Uta Reuster-Jahn and Roland Kießling, “Lugha ya Mitaani in Tanzania: The Poetics and Sociology of a Young Urban Style of Speaking with a Dictionary Comprising 1100 Words and Phrases”, *Swahili Forum*, Vol. 13, 2006, p. 154.

⑤ 例句: Mnoko hupendi kusema uwongo. 伪君子擅长说谎。

⑥ 例句: Yeye hufanya mambo mabaya, kweili ni mnoko. 他总干坏事,真是个恶人。

⑦ 例句: Ali ni mnoko, anapenda mtu kumuamulia jambo. 阿里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他喜欢别人替他做决定。

⑧ Ebrahim Hussein, *Kinjeketile*, 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 中文译本收录于蔡临详译《未开的玫瑰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三）内借和外借

身处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所能记录到的街头斯语是不同的，由于这种口头语言的传播实际上先在各种较小的领域发生，之后才传播开来，所以笔者增加了一些专门领域和词汇类别的细分。经过整理发现，在需要对外保密的领域和需要尽量对外公开的领域存在侧重点不同的内借和外借现象。

比如在旅游行业内人们就发明了一些暗语。向导带着游客在大草原游猎时，凭借他们多年追寻野生动物的经验，大致可以判断出何时何地野生动物较多或能看到捕猎、交配等特殊景象。他们互相配合，在观察到上述情况时立即通过对讲机用专门词语提醒对方，一来简单便捷，二来游客并不懂这些指代，等到野生动物突然映入眼帘时，游客们会非常惊喜，常会赞叹向导丰富的经验，进而也会因满意他们的服务而支付更多的小费。

这些专门的交际代码多使用与这些动物最相关的一些特征来“以偏概全”，如“wajuu”指花豹，“wachini”指猎豹，“sharubu”指狮子^①：花豹经常在树上休息，也会将猎物叼到树上食用，避免狮子等野兽的抢夺，所以用“wajuu”（上面的动物）；猎豹通常在平坦的非洲大草原奔驰捕猎，所以用“wachini”（下面的、地表的动物）；狮子脸部长满了鬃毛，就像人类的胡须，所以用“sharubu”（胡须）。这些暗语的发明几乎不使用任何外语单词，因为其发明背景就是尽量避免让别人了解交流者所交换的信息。类似的现象在一些特殊领域也较为常见，比如在贩毒活动中，毒贩群体习惯用特定的行话来代替关键词以避免追查和泄密，由于获知的渠道较少，笔者目前对收集到的此类单词尚无法做到准确界定。

与这种大量内借的情况正相反的是那些与“现代性”概念关联较强的领域中的外借现象，比如与高等教育、正式的雇佣关系或现代社会的生活观相关的词语，近些年存在进入日常生活使用语言的倾向。英语作为殖民时期的重要语言，至今仍是坦桑尼亚事实意义上的“官方语言”^②之一，并被街头斯语广泛吸收和转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化主要是通过音译实现的，比如街头斯语的“dhis taimu”来源于英语单词“this time”，

① 感谢沈玉宁提供的信息。

② 前文已经提及，坦桑尼亚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官方语言。

且二者在意义上保持一致,均为“这次”的意思。^① 这种形式在街头斯语中普遍存在,各类词性都有涉及,比如斯语中表示黑色的形容词“-eusi”,使用街头斯语的人说“blaki”^②,斯语中表示写作业的“insha”(议论文),有些人用“atiko”代替。^③ 这一现象的存在可能是因为说话人觉得英语更新潮,也可能是因为某个英语表达的含义在标准斯语里有多种对应,说话人认为直接借用英语的概念更为恰当,比如英语的“stick on/to”虽然是动词,但也会在街头斯语中被使用,音译为“-stiki”^④,这个词在标准斯语中意为“-kazana”(坚持不懈地工作)/“-shikilia”(坚持某事、努力保持在某个地方)。

无论是“以偏概全”的内借还是原封不动音译的外借,这些有意或无意发挥创造性的过程,在保持了相当高的包容性的同时,也在各个领域对街头斯语自身进行调整和更新。作为由使用者创造出来的群体内在联结,街头斯语也在自发地定义现代非洲社会青年文化的主体。笔者认为,保持定期追踪街头斯语语义的发展并将其与外部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可以提供观察坦桑尼亚社会发展趋势的独特视角。

五 结语

坦桑尼亚的街头斯语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与坦桑尼亚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现象。俚语化、口语化的斯语早已萌芽,20世纪50年代它的发展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末,街头斯语作为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语言也开始获得高速发展,这与近四五十年全球化、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坦桑尼亚社会变迁密不可分。从内容来看,街头斯语作为一种城市青年语言反映了坦桑尼亚的社会状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化,它在与标准斯语的碰撞和融合中发展。从形式来看,街头斯语在形近意同、形同意变以及内借和外借等方面体现了坦桑尼亚城市青年所进行的话语实践的时代特色和意涵。在

① 例句: Dhis taimu siwezi kuendelea na kazi hiyo. 这次我不能再继续做这个工作了。

② 例句: Ana shati blaki moja. 他有件黑衬衫。

③ 例句: Ameshasoma atiko zangu. 他已经看完我的文章了。

④ 例句: Lazima uache pombe, halafu stiki na shughuli za maisha! 你必须得戒酒,然后专注于生活!

进入新千年后，“街头斯语”的研究成为世界学术斯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虽然街头斯语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其中大部分词保持了连贯的可解读性，不同年龄层之间语言实践的包容性和多变性为我们观察东非斯语社会提供了独特又鲜活的视角。

【责任编辑】沈玉宁

ma constantly integrates hi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into the literary creation. His last novel *Allah n'est pas obligé*, especially shows a complex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heritage and the criticism of Ahmadou Kourouma of the Négritude, based on the text, author hopes to learn about the Ahmadou Kourouma's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criticism of Ahmadou Kourouma of the problems in the African society and the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African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Négritude; Ahmadou Kourouma; *Allah n'est pas obligé*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The Discourse Practice of Urban Youth in Modern Tanzania

Ao Manyun, Yan Ziyi / 208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the Tanzanian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wahili language as one of the key instruments in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This policy has successfully made Swahili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Tanzania. However, despite the state's continued emphasis on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urban Tanzanians have created and developed a more colloquial form of expression, namely the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As early as the 1950s,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1980s, it developed rapidly in urban areas, and most of its users were urban youth. This article collates the data of the author's field survey in Tanzania from 2008 to 2016. By comparing the previous representative Street Swahili dictiona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analyzes how its creators practiced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discourse practice and modern social change in Tanzania. We found that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embodies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as well as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ts rapid growth was amplified amidst the waves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within the coun-

try.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discourse practice of the youth established a bastion within the Swahili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most of the *Kiswahili cha Mtaani* (Street Swahili) vocabulary remain decipherable thanks to the mutual inclusiveness of Street Swahili and its standard language. This unique inclusiveness, together with the vital usage of *Kiswahili cha Mtaani* in different places, are all embedded into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Kiswahili cha Mtaani*; Urban Youth; Social Change; Discourse Practice; Tanzania

The Spread of Indian Culture in South Afric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Zhou Haijin / 226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ndi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oversea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soft power diplomacy based on its increasing national strength and great power strategy. As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y of Africa, South Africa is an important window in India's strateg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plomacy to Africa. In recent years, India tak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such as movies, yoga, handicrafts as the carrier, and takes advantage of the diaspora advantage and celebrity effect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spread of Indian culture in South Africa, and takes South Africa as the base to strengthen its radiation power and influence on the whole African continent. Compared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Indian culture, the Chinese culture in Africa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ntegrate and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excellent culture in South Africa based on our own cultural advantages;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and appeal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e, advanced culture an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the CPC's governance culture as the core in South Africa; And establish effective platforms and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frica,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in many fields such as scholars, think tanks, film and television media, and sports culture.